

从不同的

角度

探索

中国传统社会

的

底蕴

及其

与

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 社会经济 与 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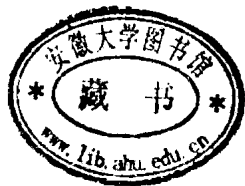
叶显恩 卞恩才 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

——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蕴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主编 叶显恩 卞恩才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蕴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叶显恩 卞恩才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9
ISBN 7-218-03760-7

I. 中… II. 叶… III. 社会发展—关系—现代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704 号

责任编辑	戴 和 王秀燕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封面设计	张竹媛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插 页	1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760-7/F·518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叶显恩 卞恩才

自从 19 世纪 40 年代西方列强用其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现代化”这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字眼，一直拨动着炎黄子孙的心扉。企望有朝一日，中国也跻入现代化的门槛，以彻底洗刷鸦片战争以来因落后挨打的耻辱。由于现代化是一历史的进程，其内涵是因人而异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关于这一问题，本书中吴承明先生的《现代化与中国 16、17 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一文，可资参考。

长期以来作“天朝大国”迷梦的中国人，是在英国战船的炮声中震醒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近百年连绵不断的灾难。梦中挨打，醒来才朦胧地感到“坚船利炮”的威力。清明贤达如林则徐，承钦差抵达广州，便觉察到英夷的优势在于“坚船利炮”。于是，他下令仿造、购置西方的轮船。同时派人搜集有关西方的资料，由他的朋友魏源加以研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应当说也表达了林则徐的看法。这里所说的“长技”即指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亦即“现代化”。（近代化与现代化是同义语。）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大致说来，中国的先进人士是把西化与现代化等同视之的。清代同治（1861—1875 年）

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等所推动的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历史上称之为“洋务派”。他们先后设立了安庆的军械所、上海的制炮局、南京的金陵兵工厂、上海的江南机器局、福州的船政局、天津的械器局、大沽的新式炮台、招商局、上海的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以及清季各省设立的西学局、电报局、铁路、矿务局、武备学堂等等；在民间，也出现陈启源于1873年在广东南海创立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尔后又出现的轮船航运业、商埠、码头、电灯、工矿、银行、百货公司等等；这些都是企图在近代中国实施现代化的尝试。

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则是从追求科技的进步，逐渐扩及政治体制的革新。诚然，也有人认识到，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单作近代工业化的尝试是徒劳的。张之洞、康有为、孙中山，就是其杰出的代表。张之洞已经认识到“西技非要，西政为要”。^①但是，他是一个首鼠两端，畏首畏尾的官僚，他既认识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又没有站出来谋求清朝已病入膏肓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说明他对西化只停留在“用”的层次上，还没有涉及“体”。少他21岁的康有为比他进了一大步。他搞的“戊戌变法”，就是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力图改革清朝的政治体制。少康有为8岁的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更是模仿西方，搞民族革命，建立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已是力图政治上西化了。在政治现代化上，他们一个比一个急进。但是，张之洞虽有学西方之心，却不能越旧政治体制雷池一步；康有为鼓吹英式的“君主立宪”，又同时搬出“今文学派”，以表示他的“变法改制”是“存亡继绝”，非属以夷变夏。孙中山也自认是“承继文

^① 见张之洞《劝学篇》。

武周公的道统”。这说明他们三位在追求现代化中，都无意将现代化置于历史传统的对立面，不自觉地受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都认为以欧美为模式的西化，就是现代化。持此看法者，如同古典现代化学派一样，把传统与现代当作一对互相排斥的概念来对待。他们没有看到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通向现在——尽管其间经过新陈代谢。他们把历史传统置之不顾，认为只要全盘照搬，或移植西方的一套制度，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西化”犹如万应灵丹，对任何地方都可适用。这显然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这一看法，与新现代化论的文化主义观点大相径庭。在新现代化论文化主义观点看来，传统与现代不仅同时存在，而且是互相渗透，互相包容。传统依附历史，历史承载传统。传统不是如同历史般一去不复还。

“西化主义”，在中国前一个时期，已经几乎为人们所遗忘，但近来随着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与西方交往日趋密切，现代化即“西化”的看法，又甚浮尘上，颇有回潮的趋向。抱这一见解者，往往出自对西方文明的崇尚。而他们所谓的西方“文明”，又多从宫室的高崇，服饰的华美，外观的浮华着眼，没有把精神文明等指标包括在内。实际上，在现代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生活过的人，已痛感这种“文明”的弊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根据自身的感受所说的一段话特别深刻，他说：“物质的丰富带来了贫穷。车和充溢于生活中的电器制品，使真正充实的人类生活从人们中丧失了。电视夺走了家庭中谈笑的时间，‘文明’的速度迫使人们计较时间，那种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的愉悦再也没有了。‘文明’的贫穷不是金钱和物质的缺乏，而是精神生活的缺乏。”他指出，“人们从维持生命的生活原点看到了近代文明

的虚饰，在维持生活的最底线反而看到了人性的尊严”。^① 在我们全面实施现代化中，难道还要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这些缺陷吗？日新月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创新，是祸，是福？尚待历史的检验。记得建国初期，有人曾用“远处的工厂冒黑烟”的诗句，歌颂刚起步的工业。今日方知为发展工业而制造的“黑烟”正是污染环境，扼杀人类自身的恶魔。今日世界各国对加强环保意识的认同，就是因为工业化而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的。

目前似一般都能认同的看法是，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且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迁；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过程。其趋势是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推进：深度是由物质、制度、思想层次逐一推进；广度则包含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② 但是，这种演进不是孤立的、封闭式的，而是在各自的演进中互相推动，互相促进。而且现代化的程度愈深愈广，彼此的互动关系便愈加密切。面对高度现代化国家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冲击，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因受其历史传统的制约，所作的反应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参照其传统，“择其所长”而模仿之，从而导致其自身社会的全面变迁，而这种变迁是为该社会的成员所认可、所接受的。所以，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当应有各自的内涵和特点，并非现代化就是统一的范式——西化。虽然我们说各国的现代化各有其特点，并且都将结出各有差异的现代化之果，但就其归趋而言却最终导致各国彼此融会贯通而趋向一体化，都结出知识经济和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政治的现代化之果。这就是因为大家都共同吸取了国际上先进的

① 《中国研究月刊》1995年4月号。

②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动向》，见《现代史论集》第一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之缘故。

当前，发展中的国家都面临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根植于其历史传统，因而自当表现出各有特色。各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可谓是理一分殊，又呈现出最终归趋的会通。

现代既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传统与现代是连续的无法割裂的链条，现代化的进程与归趋，无疑要受到传统的制约。为了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与海南省文化交流中心于1999年3月25日至27日在海口市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盛会的学者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他们当中有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研究领域作出奠基性贡献的资深学者，也有正处盛年、学有根柢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专家、教授，还有充满朝气的后起之秀。他们都围绕本会议的宗旨，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除了历史学家之外，还有经济学界、新闻出版界和企业界的专家和朋友们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在会上贡献了他们对现代化的研究所得和亲身体验。

基于篇幅所限，我们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出25篇，并将三位著名学者的访谈录作为附录，辑成这本集子。这些论文的作者、访谈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传统社会和经济，或从其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吴承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会上作了题为《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的主题讲演。他首先指出“现代化”与“近代化”为同义语，并追述了人们对现代化内涵认识的历史过程。他认为16世纪西欧现代化因素出现时，人们尚无“现代化”这一概念，流行的主要是重商主义见解，以通过贸易增长一国的净收入为目的。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工业化成为讨论的中心，重视新的

技术装备。19世纪以降，乃更注意资源的有限性，边际主义盛行。至20世纪前期，对现代化的认识集中于物质方面，忽视人和社会，强调国民生产（GDP）的增长，忽视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科学技术给人以巨大的鼓舞，提出人力资本理论，重视智力投资。同时对人和社会状况作了深刻的反思，意识到现代经济以人和环境为牺牲的危机。从原来对经济的发展几乎是线性概念，到70年代变成结构主义；原来以人均收入衡量经济增长，此时也提出人文指数、预期寿命、男女平等都作为衡量指标。80年代，提出精神文明问题，文化与公共道德纳入现代化范畴。90年代，知识经济成为要务，同时，“拯救地球”、环保和持续发展成为急务。该文还就现代化问题历史观上的变化、西欧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发表了看法。作者尤其对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儒学思想的变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这些变迁中找出中国历史上现代化因素。指出“经济上的现代化新因素须引起制度上的变迁才能保证其持续发展，经济和制度的变迁须从社会变迁上来验证，而所有这些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所制衡（conditioned）。制衡有二义，一是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经济、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二是文化思想变革又常是社会和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在思想史上称为“启蒙”。在西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可概括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则是儒学。

资深学者方行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受到三个机制的制约，即封建国家通过政策、法令制度等来对经济作干预（一只看得见的手），封建地主以地租与地租的再投资来对经济所作的干预（另一只看得见的手），以及各个时期发育程度不同的

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国家干预、地主干预和市场机制既是统一，又相对立。在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中，三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又互为消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秦汉至唐代中叶，国家干预占居主导地位。唐代中叶至明清时期，国家干预松懈，地主干预兴起，市场机制作用扩大。明代嘉靖、万历年间（16世纪），封建经济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方行先生提出的三个制约封建经济运行的机制，及其彼此消长而呈现出的阶段性的理论架构，是一精僻、独特的见解。顺带指出的是方先生在该文中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内涵作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探讨中国封建经济的结构、运行、机制和效益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不同于传统规范，具有别开生面的提法，值得学术界重视。

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的黄宗智先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讲座教授）根据他最近的研究成果（《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题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指出，清代的法律制度是由背离和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的。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既矛盾又统一，既背离又抱合。清代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具有高度道德化的理想和话语，另一方面在操作中比较实际，能够适应社会实际和民间习俗。这是这个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秘诀。我们既不能只凭它自己的表达和意识形态来理解它，也不能只凭它的实际行为而作出解释。要看到它表达和实践双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矛盾。他认为，从法律的表达看有保护弱者的儒家仁慈的一面，例如禁止“违禁取利”，借债利息限于月三厘内，规定地主不得私禁其佃农或对之用刑，等等。同时，又体现君主独揽大权，制定一套犯禁惩罚的条规。仁慈和严厉两副面孔构成所谓“父母官”的形象；缺乏自主、任由官府摆布的老百姓，便是官方所表达的所谓

“子民”。君主集权的意识形态防止法律制度向司法独立和公民权利的方向演变；法律制度始终随时可能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诸如此类的看法，是耐人审味和给人启迪的。不难看出，法律上父母官与子民的等级关系、缺乏司法独立和行政干预司法的传统，时至今日并没有消失。黄先生同意新文化同行的看法，不要以西方的现代化当作全人类的准则，忽视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研究中国（包括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不能盲目抄袭。

赵冈教授（威斯康辛大学）在《垂直分工与工业化——从明清农村棉纺织业谈起》一文中，以明清棉纺织业为例，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差异及其后果。他指出，在实施工业化过程中，通常采用“水平分工”或“产业分工”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辅以“垂直分工”，即将生产过程分解成若干工序，分工序独立完成。日本的工业化顺利而快速；中国则迟缓而多波折。其原因固然很多，是否实行垂直分工是其一，甚至可能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中日两国工业化过程之差异可以看出，中国是受了过剩人口之累，无法像西欧那样由“原型工业”转变成“现代工业”。日本则有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将过剩的劳动力排除到农村之外。而且，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企业家尽量利用垂直分工，将新式工业与旧的生产技术相配合，合理利用人力，将阻力化为助力。中国的新兴企业家则没有这种眼光，忽略了垂直分工的可能性，未能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排出路。直到最近，乡镇企业兴起，才走上垂直分工的模式。

郑学檬教授（厦门大学原副校长）的《16—18 世纪中国市场和市场经济门外谈》一文，从传统的角度，追述了市场经济孕育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市场经济孕育于宋代，萌发于明代中叶。明代的嘉、隆、万和清代的康、雍、乾两个时期，其萌芽规模已

弥足称道。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因中国已卷入国际市场，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1949年—1978年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出现重新自然经济化。自1978年后，由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90年代后，市场的发育正向区域化、国际化、资本化方向前进。我们从郑教授的分析看，市场经济可以暂时退化，但其传统是不可以消失的。郑教授在本文中，还对16—18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及其缺陷作了分析。

吴量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中国传统商业经济的约旨——企业现代化理念》的论文，考察了中国商业的历史演变，认为历代皇朝都曾推行过“重本抑末”的政策，企图限制商人和商业的发展，事实上商人和商业的经济力量不是日益削弱而是日益增大，社会地位不是日趋低下而是日益提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悖反的现象，是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商人道德和商业精神及其指导下的经营思想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建构现代企业文化时，固然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也不能不吸取中国优秀的商业文化遗产。

以上数位学者，都作了长时段的，或宏观的总体的考察。更多的学者则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层面，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作了探索。

关于市镇经济和商业流通方面，韦庆远、川胜守等九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川胜守教授（日本大正大学教授、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将其多年研究所得，高度浓缩成《明清江南市镇经济与现代化》一文，先奉献给与会学者。（其详细的研究成果，请参见后来由汲古书院于1999年8月出版的《清明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川胜教授在其大作中指出，苏州、嘉兴、湖州和杭州地区，从历史观之，早在宋代，市

镇中已零星可见拥有产业都市的物质；明清时期，盛产生丝绢织品。现在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及湖州市吴兴正逐渐区域一体化。杭州市的经济快速发展正逐渐吸收附近的嘉兴、湖州两市之郊外农村。此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是投入的资本多为当地所挹注，接近私人资本的性质。其经济发展的好景气真是令人感动。16世纪—18世纪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景况于今日完全复活，而且与首都北京、天津、山东、广东省的深圳、福建省的福州、厦门及上海等都市相异，展现出不同区域的经济潜力。这里，不难看出历史传统的延续性。

韦庆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明中叶从抑商到恤商、惠商的政策转变》一文，探讨了明中叶商业政策的转变。重本抑末，是中国古来的传统。明中叶（16世纪），进入了世界大航海的时代。新大陆的发现，东方航线的开通，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征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蓬勃的发展，传统的商业正在发生转型。作者用具体的史实，说明明代自弘治以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继续出现并逐渐高涨的重商恤商思想，经历六七十年的酝酿，在隆庆中后期才被朝廷认可，并对原有的病商扼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从总的演变趋势看，传统的承续是不可能消失与逆转的。但事实上历史的变迁却是纷纭复杂的，有时也会出现与历史演变趋势悖反的情形。李庆新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一文即从管理海贸的政府机构市舶司的变态，探讨了明初一反唐宋海贸开放的传统，实行海禁、闭关的政策，市舶司这一机构也改变其传统的功能，从以管理海贸为职责转到“怀柔远人”，“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政治手段。这种既违背中国传统，又与世界文明潮流相悖反的举措，造成中国在物质文化与技术、经济与制度等方面多落后于西

方，阻碍现代化因素萌发的恶果。李玉梅副教授（香港教育学院）在《明代商业机构之启示》一文中，也力图通过明代官、私营工商业之消长，以及明代商人组织和经济伦理之转型的论述，展示历史传统的延续及其对今日工商业现代化的启示。

商业网络，是商人借此作资金的筹集、商品的流通，以及与商业有关的人事（包括与官府）关系图。明清时代占据商界鳌头的徽商与晋商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凭借地缘与血缘等关系结成的商业网络。商业网络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李培德博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题为《19世纪香港粤商之商业网络》一文中，以19世纪的香港粤商为例，对这一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借助网络这一既非市场，又非制度的独特形式来展开各种商业活动，可以将一个群体、一个地方的商业势力扩展到全国，甚至海外各地。这是网络的正面功能。但是，也不要忘记网络的背面，亦有自我制约和排他性强，使族群间产生磨擦的负面作用。看来，作为商业传统的网络，在其现代化中似不仅不会消失，且可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显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榮禄（台湾中正大学副教授）在题为《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一文中，则探讨了鸦片战争后广东航运业近代化的特点，以及粤商（主要为买办商人）所充当的角色。作者指出，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以炮舰开道，辅以外交，以缔结条约而取得特权的条件下掀起的。粤商面对广州作为外贸中心的丧失，不平等条约宣告行商制度的死亡，没有如同闽商般无所作为，而是因应形势的变化，随同西商迁移上海，作战略转移。先从之学，再与之战。他们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为兴办近代化实业积累了巨量的资本。粤商在上海推进航运业的同时，由于在家乡有可供利用的机会成本、人力资源等优势，在西商难以涉足的中小河

涌，以小轮船推进航运的近代化。他们中的代表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在被迫开放的上海等口岸致力于航运近代化，与西商进行商战。他们尽管受到了一些人的诟病，但是在兴办实业，推进中国近代化上，的确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叶汉明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20世纪初山东地方绅商层的形成：潍县的例子》一文，以山东潍县为例，考察社会近代化的变迁中绅商合流的情形。潍县于1906年被开辟为对外通商的商埠后，加速了商业化的进程。纱布商/买办主、烟草买办等商业精英崛起的同时，传统士绅层也发生了蜕变。传统士绅善用固有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资源，复参与始自晚清的现代国家建构工程，试图跻身议会、商会、新式教育事业等领导层中，以更新其政治、社会力量，建立操控地方的新方式。面对世纪之内外挑战，地方领袖有很灵活的生存策略和很强的韧力。他们充分利用“现代化”语言的新资源，来重建自己的合法地位。叶教授的论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统势力如何适应近代化转变的例子。

汤熙勇副研究员（台北“中研院”）的《战后初期台湾的海运与货物运输（1945—1949）》一文，就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至1949年10月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前的一段时间，对基隆、高雄两大港口恢复的过程及其面临的困难，包括接收台湾船只及港口的实体，即政府的角色及其功能，海运航线的建立与限制、船只的取得与经营，并比较进出口货物在1945年前后的差异等相关问题作了论述，进而分析海运与战后初期台湾港市的关系，以了解台湾港口的整体面貌。

朱德兰博士（台北“中研院”副研究员）在提交会议的《从台拓档案看日据广东时期的中日合办企业》一文，根据庞大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档案，并参照其他文献，对日本侵据广东

期间，出自搜括中国资源以支持其侵略战争的需要，总部设在台北的台拓公司先是以日本侵略军军部嘱托的名义，前赴广东展开经济掠夺活动，继而为了有效供应日本侵略军粮草，又成立所谓“兴粤”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过这一暂鲜为学术界所论及的课题作了论述。

现代化是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诚如吴承明教授所指出的，直至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现代经济是以人和环境的牺牲而取得的。物质丰富了，但青山、绿水和蓝天却在日益消失，人的生活环境逐渐恶化。因此，环境保护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愈来愈受重视的问题。李根蟠等三位先生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层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李根蟠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古代农业史的研究用力殊深，他提交会议的《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业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一文中指出，保护与合理利用资源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之初即已萌芽。先秦时代和反映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关记载比比皆是。这一思想是古代“三才”理论的重要基础。所谓“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宇宙的三大要素，彼此相互依存，是人与自然协调与统一的关系。“三才”思想应用于农业，使中国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使中华文明成为惟一延续下来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中国优秀的传统农业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在现代化中正日益显露其优越性。这是一篇值得重视的论文。彭世奖教授（华南农业大学）的《从中国农业发展史看未来的农业环境》一文，把中国农业的发展史概括为四个阶段。一、掠夺式农业（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以牺牲大片森林为代价，开创了人类的文明。这一破坏生态环境的行径，终为新的形式所替代。

二、能量循环式农业（传统农业），其最大的特征是通过施肥，使能量循环流动、多级利用，并结合其他精耕细作技术使土地久种不衰，产量不断提高，对生态起到相对稳定和净化作用。但因其缺乏外部投入，不能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又为投入式农业所替代。三、能量投入式农业（现代农业），近数十年的中国农业，是从能量循环式走向能量投入式的农业，亦即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期。由于土地的垦辟，水利的兴修，化肥、良种等各种先进技术成果的采用，已使中国的农业取得了以占世界 7% 的土地，养活占世界 22% 人口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如盲目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湖泊缩小。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投入，使土壤污染，土质下降，而且大量粪便和城乡垃圾成为可怕的污染源，使原来能量循环系统中断。没有内部能量循环流动的系统是不能持久的，因而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四、新型的能量循环式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这就是要使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能够循环流动，也就是把人畜粪便和工农业的废物进行资源化处理，使其加入农业生态系统的循环；建立起城乡之间能量循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新型农业，使农业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协调发展，以共创人类未来的绿色文明。这是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中国传统农业目前面临的出路。彭教授的见解当是切合实际的。刘正刚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以《明清之际南方虎患考述》为题，从虎患角度考察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刘教授指出，虎吃人习性的养成，既有环境的关系，也有人为的因素。如果环境适合虎的生存，野生动物丰富，虎觅食容易，一般不会袭击人。明清时期因人地矛盾尖锐，进而造成虎与人的矛盾也发展到对抗的地步。虎之为患因此出现。对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增长作出历史的反思，正是目前实施现代化中所应当注意的。